

# 生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编者按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在“学术性”诉求的强力刺激下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是以现代西方哲学的某些概念甚至观念重新阐释或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现代西方哲学装饰马克思主义哲学几乎成为一种时尚。在许多论著之中，人们见到最多的与其说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不如说是关于西方哲学的某种评介。以西方哲学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仅仅是研究手段的变化，它所揭示的问题的尖锐性在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是中国实践的理论形态还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样态？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因此，从生活哲学的角度，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验和教训，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基础，同时也是研究者不可推卸的责任。这里刊发华侨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学科的一些研究成果，以期引起研究者对此作进一步的思考。

生活哲学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华侨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南开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杨楹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生活哲学的架构内来加以审视，清晰地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双向互动逻辑。这一逻辑保持着理论与实践、学术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关系。若背离此互动逻辑，理论上必然是教条主义和丧失实践性的非马克思主义，实践中必然是陷入乌托邦或盲动主义。

马克思主义具有“现实化”的理论品质，是马克思主义可以“化”中国的首要前提。其“化”，从理论上讲，蕴涵着两层基本的含义。首先，它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传统哲学解释世界、为现存世界辩护的纯粹理论形态，显现出强烈的现实性品质。它以揭示生活的本质、改造现实生活、构造新的生活世界，为其理论的价值指向与目标。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以往理论之间的质的差别。其次，马克思主义自身是开放的、待完成的。它不仅能够“中国化”，而且也曾“苏联化”、“东欧化”，由此指示出马克思主义必然是在“化”的系列中存在并发展着自身。这样，马克思主义就不是区域性、地缘性的改造现实的理论，而是具有“世界主义”的指向。在这一过程中生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生形态”与“衍生形态”之间的“一”与“多”、“源”与“流”的关系，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家族的理论谱系。

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路径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解析其生活之前提、内容，进而指向“无产阶级”全面异化的生活世界，通过“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结束人“类”的“史前史”，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决定了它必然要“化”为现实，“化”为生活。

从学理上讲，马克思主义“化”中国，蕴涵着鲜明的排他性、唯一正当性等属性规定。循此规定的理路，我们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认知深度，构成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之可能的必要前提，二者缺一不可。这是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实现理论现实化与现实理论化双向互动的根本要求。在实践中，离开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研究，其结果只能是以“经验主义”来替代马克思主义；同理，离开了对中国现实需要的客观、准确的把握，则必然会导致以“教条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来裁剪“现实”。

但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其间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从片面、肤浅、错误走向全面、深刻、正确的逻辑，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状况和认识水平规定了国人对置身于其中的国情的认知深度与完整程度，同时也决定着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水平。事实上，我们根据不同时期的现实需要，将马克思主义解读为“革命的”学说、“斗争的”理论、“发展的”指南、“生存的”导向等。这种理论选择的侧重点之别，映现出理论解读中的现实境遇，其间是否存在着因“为我所用”而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批判理论”与“社会发展理论”等诸多理论的有机整体割裂开来和简单化之嫌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马克思主义“化”中国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预设的。如前所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决定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成败及其程度，其间存在着（不断）“民族化”马克思主义的空间。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与精神纽带，马克思主义必然不断地同多民族文化进行沟通、重组与整合，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现实化道路上不断需要进行的文化竞争与批判性渗透。由此，也就生成了“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东欧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承载着不同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究竟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精神的一致性呢？是其理论本身的多元文化呈现，还是其方法论的民族特色？抑或是通过二者有机统一而形成的新文化中所体现出的“原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此而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研究本身就是改变现实的实践之内在环节，而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引发的问题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譬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间如何契合：是通过两种相异的价值体系之间的对话和沟通达成“视界融合”，还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体系简单取代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华民族的传统命运如何？20世纪之初，作为众多影响中国的西方思潮之一，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并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是俄国革命之召唤，还是马克思主义改变民族命运的价值理念、行动模式与本民族心理、价值诉求（方式）之间的深度

共通性，使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问题都需要做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而这样一些“问题”到底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抑或这种“化”本身就体现出“文化间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不仅仅是文辞的转换，其本身就直接关联着不同的文化意向、文化心理、文化思维方式、文化命运、民族性格等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

检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文化融合过程，我们发现，无论是采取“洋为中用”的“体-用”整合模式，还是贯彻“拿来主义”的原则，都未能很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果要么是“食洋不化”，要么是引发民族文化的自卑、难以谈及马克思主义与本民族文化精良成分的有效融合，从而难以实现观念的革命和情感的认同，进而造成文化生命力的弱化。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抽象论之，必须切入中国现实生活，根据生活的变迁做出选择。这是超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立性思维方式的有效路径。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待完成的事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样保持着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为我们探索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合法的理论话语空间。我们认为，与其忙于传播别人的“真理”，不如坐下来深入研究自己的问题。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还是现实的实践摸索，都必须直面全球化视野下中国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做出符合时代的回答。因为只有这样，现代性尚未完成的中国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良性互动。

## 生活哲学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

华侨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马迅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指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页）这段话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哲学研究的学术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立场。

首先，哲学作为“批判”，指向的是批判者“自身的物质环境”以及批判者自己的哲学。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和青年黑格尔派来说，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即当时的“德国现实”，他们的哲学即当时的“德国哲学”本身。他们应当既批判当时的德国现实，又把自己的哲学当作德国现实的产物进行批判，并在扬弃自己哲学的同时超越德国现实，从而“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然而，青年黑格尔派却犯了双重错误：第一，他们批判的不是他们自己所面对的德国现实，而是“一般人”的现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第二，他们没有从自身的物质环境出发来理解自己的哲学，而是把自己的哲学理解为不需要任何现实前提的哲学，因而对自己的哲学本身缺乏批判，使这种哲学失去了现实针对性。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满足于对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的双重批判，而且要求对两者之间的“联系”进行批判；不满足于对“批判”哲学和它所面对的物质环境的双重批判，而且要求对两者之间的“联系”进行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决不仅仅是一种理论的批判关系，而且具有“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因此，“在理论上进行批判”和“在实践中加以变革”，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同上，第58、59页）青年黑格尔派只注意理论批判，不注意实践批判，这就使他们“完全合乎逻辑地提出一种道德要求，要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从而消除束缚他们的限制”，“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他们忘记了：... 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同上，第66-67页）“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同上，第75页）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学术”并非与现实无关的“纯”学术，而是在扬弃现实的过程中建构现实的理论；他们所理解的“现实”也与“现存世界”不同，它内在地包含了批判与超越精神。这样，哲学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变成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何以如此？因为马克思关注的焦点是人的生活。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说：“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因为“人们自己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研究了“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认为“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不仅决定人的本质，而且决定人的存在，因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同上，第67-68页），“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同上，第72页）。

对于马克思，与其说“世界统一于物质”，不如说“生活统一于生产”，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因此，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入手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研究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条件。这就是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中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中正确地指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以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发生了脱节。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与现实性成为“两张皮”：在社会民主党人那里，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科学性”压过了批判性，从而使西方无产阶级失去了对资本主义进行根本改造的革命意识，陷入了改良主义；在共产党人那里，马克思主义的所谓“革命性”压倒了科学性，从而使东方国家的人民群众失去了“不断革命”的现实基础，陷入了空想主义。结果，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被纳入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成为资本主义自我完善的动力；东方的“共产主义”运动则在理想的泡沫破灭以后，最终不得不回到严酷的

现实中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才再度成为问题。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要求我们既不能单纯地“回到马克思”，也不能单纯地“回到现实”，而必须是“回到马克思”和“回到生活中来”的结合。只有这种结合才能重新实现马克思主义“学术性与现实性统一”的品格。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意义上，“回到马克思”不能停留于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更为重要的是回到马克思的批判与他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回到生活中来”也不是离开马克思的理论走向现存的日常生活世界，而是回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对象化扬弃于自身之内的现实生活。正因为如此，“回到马克思”和“回到生活中来”的统一不是从马克思的文本中提炼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然后拿它“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没有这样的“普遍原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根本不存在这种脱离具体实践的“纯”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身就具有实践性，正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本身就是包含理论批判于自身的实践一样。因此，“回到马克思”和“回到生活中来”的统一，实际上是回到马克思的批判与他的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通过借鉴马克思对两者关系的处理，来研究我们如何处理自己的哲学与我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

在生活哲学的视野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对现存世界的反映，而是对改变现存世界的实践的诠释。只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保持其“实践诠释学”的品格，它就必然是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统一。相反，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对现状的“反映”，或脱离实践的“纯”批判，那么，不管人们如何高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就仍旧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 生活哲学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

华侨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彭立群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被动地纳入了全球化的进程，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嬗变中的中国社会见证了我们民族的抗争与复兴。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无疑承载着时代的精神诉求。从反映和指导实践到与实践脱节，毛泽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曲折的发展轨迹。为了更好地应对世界历史的召唤与挑战，我们需要对那个打上毛泽东思想烙印的时代进行梳理与反思。

资本主义的入侵瓦解了传统中国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生活世界，从此以后“尊尊亲亲”的儒家理论已不能承担起凝聚全民族力量的使命，如何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在变化了的生活条件下，民族精神的重塑成为当务之急。“中体西用”的洋务派理论、“君主立宪”的维新派理论和“三民主义”的革命党理论都没有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洋务运动倚仗的是旧官僚，维新变法依靠的是未割断儒家文化脐带的旧文人，革命党的基础是受西方近代思想浸淫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地方实力派人物：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脱离群众。以精英自居的他们不屑与“群氓”为伍，再加上各派力量纷争不断，其失败就不足为怪了。民众也有过自发的反抗，但“返魅”的太平天国运动与承接“怪力乱神”传统的义和团运动都远离了时代的要求，于是近代中国一再出现抗争——失败——再抗争——再失败的恶性循环。究其原因，就在于所有这些力量都没有真正把握中国人生活世界变迁的内在要求。

毛泽东一方面意识到，在十月革命以后，资本主义陷入全面危机，世界已经进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因此中国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而不能是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意识到，由于中国社会生活状况的极端落后，无产阶级人数极少，不可能指望无产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主体。他明确指出，与苏联和西方不同的是，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革命的主体只能是农民，而不能是其他任何阶级。旧官僚、旧文人，以及与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势力一起，不是革命的主体，而是革命的对象。与此不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则是可以团结的对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决定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他们只能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因此革命的领导者只能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

改变不合理生活世界的突破口在于土地革命，着重解放农民的生产力，提高农民在救亡运动中的战斗力。而要教育和组织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坚强有力的政党组织。只有这样的党才能通过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聚集为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由此，党的建设就成为革命实践的迫切需要。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整顿作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培养谦虚而严谨的工作态度、突出纪律意识等理论和实践活动，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担负起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职责，为中国革命培养了无数理想远大、立场坚定的中坚分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统一战线和党的领导之外，武装斗争之所以成为“三大法宝”之一，是由中国政治生活的落后决定的。中国的反动势力特别强大，又大多集中在城市，但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缺少最基本的民主机制。根据中国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俄国的这种具体国情，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道路只能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毛泽东对中国生活世界的状况作了比较系统的清理，为改变现存世界的斗争制定了富有创造性的战略和战术。在当时，毛泽东思想起到了统一思想、唤起凝聚力、提高战斗力等作用，它较好地满足了时代的需要，是反映生活世界要求的科学理论。以这一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实践斗争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0页）在毛泽东看来，中国身处一个世界无产阶级社会

主义革命的时代，“新民主主义社会”只能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而不是最终的目标。因此，“新民主主义论”与“不断革命论”，直到共产主义实现之前，都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问题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破坏旧生活，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则主要是建设新生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应当有一个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认识出现了偏差。在他看来，既然是“不断革命”，就“不容横插进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当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时，毛泽东立即予以无情痛击，认为这是在“为资本主义张目”。他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早就说过：“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它所应当做的是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1页）列宁更是明确阐发了在落后的小生产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行性，把它称为“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脱离实际的激进政策，使建国以后的毛泽东落入了空想主义。他没有想到，首先，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循序渐进，由此决定了对生产关系的变革要有足够的耐心。毛泽东却试图用一纸“人民法令”来跳过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自然阶段，通过“大跃进”的手段推动生产的“超常发展”，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反而延误了经济建设的大好机遇。其次，发展经济应当更多地采取经济手段，而不能用行政命令和政治运动“促进”甚至取代经济工作本身。毛泽东却迷信“政治动员”的威力，试图用政治手段抓经济。于是经济生活成为政治热情的试验场和异想天开的大舞台。再次，错误地用阶级斗争处理建设时期公民之间的关系，导致整个生活世界的混乱无序，直至引发“文革”这样的“内战”状态。

反思毛泽东时代的得与失，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理论只有反映生活世界变革的要求，才能与实践保持同步。如果脱离生活，无论是超前于当前的现实，还是落后于当前的现实，都会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重大挫折。

##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选集》，1991年，人民出版社。

## 生活哲学视野中的邓小平理论

华侨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张禹东

从纯学术的立场看，邓小平从来没有像经典作家们那样创作出任何理论名篇，因此，直到今天仍有一批学者感到困惑：邓小平理论究竟是哪种意义上的“理论”？把邓小平当作理论家，是不是中国“以吏为师”的传统在新时代的表现？

不必讳言，中国确实存在“以吏为师”的传统，当今时代确实也有人从这一意义来理解“邓小平理论”。然而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如果站在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立场，就会看到，邓小平理论根本不是从“纯”学术的意义来讲的，而是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立场来讲的，是在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诠释学的立场上来讲的。

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有脱离现实的“纯”学术，因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理论与实践是统一在一起的。理论可以直接诠释实践，也可以间接诠释实践，但不能与实践无关。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表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其次，科学社会主义本身也可以分为两个维度，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因此，有两种理论：一是哲学层次上的理论，二是科学社会主义层次上的理论。邓小平理论显然属于后一层次上的理论，即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诠释学意义上的理论。

既然科学社会主义分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所研究的显然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关系。这是对实践的间接诠释，而不是直接诠释，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更强，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现实性更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突破，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层面，而不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变革当然需要哲学的变革，但两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哲学方面的变革恰恰是学者的任务，而不是政治家的任务。

不言而喻，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特征就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时代性。立足现实是邓小平理论的本性。这种本性决定了我们既不能从纯学术角度也不能从纯现实角度，而是必须从二者的统一中去理解和研究邓小平理论。因为这个现实并不是僵化不变的或抽象的，而是一个不断生成变化的动态过程，是有着特定的时间空间结构的系统。邓小平理论的这种现实特定性不仅指时空环境的特定性，即当代中国的现实生活世界，而且还包括主体的特定性，即处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人的生命活动的特定性，以及现实的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特定性。由此来审视邓小平理论，至少有如下诸端值得关注：

从时间空间上看，邓小平理论是特定时代背景和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形态。任何理论都有特定的边界和适用范围。邓小平理论的特点不在于它具有超越时空和边界的功能，而在于它与时俱进的内在品质，在于它不唯书不唯上，实事求是，一切从变化着的实际出发。邓小平多次讲过，“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他还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同上，第3页）。而且他也是这样去努力实践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根据中国现实生活实际的变化，邓小平及

时而果断地反对“两个凡是”的方针，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迅速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中国从此走上了一条富民强国之路；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社会主义划等号、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并积极进行了实践探索，等等。在这些方面，邓小平的成功与毛泽东的失误恰成鲜明对比。毛泽东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从中国现实生活实际即革命意义上的生活实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实行了创新和实践；毛泽东之所以后来发生错误，就是因为脱离了已经转化为建设意义上的现实生活实际。邓小平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生活实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进行创新与实践。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邓小平的理论贡献就在于终止了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抽象理解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哲学幻象。

从主体性的角度看，邓小平理论是对当代中国人现实展开着的生命活动的反映。因为现实生活世界不是与人毫无关涉的自然演化的客观世界，不是没有主体的世界；现实生活是人的生活，是“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的生活。具体来说，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表现为现时代中国人生活的生产活动、中国人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主观能动性、中国人的现实的物质和精神心理情感的需要。在邓小平理论中，随处可以看到对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关切，对人民群众创造现实生活世界活动的肯定。他经常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当然，在毛泽东那里也具有同样的思想，但在后来出现了通过阶级斗争来塑造现实生活主体的偏差。邓小平根据现实的变化，纠正了这种偏差，建构了以现代社会生产为主要考量标准的人民群众主体范畴，如重新把知识分子定位为“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9页）。而且他特别重视破除思想禁锢，以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强调“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正因为邓小平理论是从当代中国人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出发的，所以才能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作为现实生活主体的中国人创造生活、改造世界的热情和积极性、主动性，从而使生产力得到解放。而中国人民在创造历史、改变生活的过程中同时也获得了自身的自由和发展。正因为邓小平理论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它才能在实践中产生巨大的能量，不仅改变了当代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交往方式、生活方式，而且也影响和改变了中国人的致思途径、价值尺度、审美情趣。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在中国农村的推行与实践，关于“三个有利于”的价值判断标准的提出以及在实践中的探索，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提出，等等，都对当今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可以说，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人最大的变化并不是在表层的器物层面，而是在深层的观念心理层面。而中国人也正是在这种历史性的变化中不断获得自我解放、自我发展。

从本质上看，邓小平理论是既立足现实生活又超越现实生活、既批判现实生活又自我批判的理论。如前所述，现实生活是邓小平理论的生命之源、力量之基。但邓小平理论不仅源于现实生活，而且超越现实生活。这种对于现实的渊源性、超越性，使得邓小平理论在其生成发展过程中就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一是对现实生活的批判。邓小平理论不仅反映日常生活，而且是对它的批判、超越和改造。而邓小平理论对现实生活的作用，也是以对现存生活的批判为切入点，通过批判显露现实生活世界被遮蔽的可能性，进而改造和提升现实生活。我们通常说的邓小平理论思维特征的与时俱进性，就是与对现实的强烈批判精神紧密结合的。邓小平理论也是在批判现实超越现实中实现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改造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对当今中国现实的批判和超越的产物，每一个参与者都见证了这一理论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巨大导向作用。二是对自身的批判。实际上，邓小平理论的现实性和科学性决定了它的自我批判性和自我超越性。邓小平理论生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就是一个自我批判、自我改造和自我超越的过程，而邓小平理论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实现自我创新、自我发展。这种自我批判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展开。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判断没有局限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理论观点，而是从当代中国的生活实际出发提出的。他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还有关于“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提法，也都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理论强烈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精神。

要而言之，在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视野中，邓小平理论不是一种经院式的哲学或理论，而是一种正确把握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的哲学或理论；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现实生活世界之间是一种辩证互动的关系；只有坚持从学术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角度来理解 and 实践邓小平理论，才能达到使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现实生活世界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效果。

## 参考文献

《邓小平文选》，1983年、1993年，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鉴传今